

论汉语隐含与英语显化的差异

——以主语和虚词对比为例

康灿辉

(湖南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7)

[摘要] 汉语的隐含和英语的显化不仅受文化、思维的影响,更是主体与客观世界互动的结果。因此是一个现实—体验—思维(社会文化背景)—意象图式—范畴、概念、意义—语言的过程。人们通过感官对客观世界进行体验,由于体验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思维,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不同的意象图式,建构出不同的抽象认知模型,并以此进行范畴化并获得概念与意义。将不同的范畴、概念、意义用语言形式固定下来,就形成了句法结构上的差异。

[关键词] 汉语隐含;英语显化;认知对比;主语;虚词

[中图分类号] H3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4)02-0133-05

Analysis of Difference between English Explication and Chinese Impl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bjects and Function Words

KANG Canhu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 The difference of cultures and thinking modes results in various conceptual and grammatical structures. Chinese implication and English explication are influenced not only by cultures and thinking modes, but the reciprocity of subject and object as well. They are a process of reality – experience – thinking – image schema – category, concept, meaning – language. People experience the external world by their sensory organs and form different thoughts and image schemas, then construct different abstract cognitive models which are categorized to form concept and sense. Languages which are established and fixed by different categories, concepts, and meanings form the diversity of syntactic structures.

Key words: Chinese implication; English explication; cognitive comparison; subject; function words

认知语言学家主张以体验哲学为理论基础,认为认知都是体验的。遵循着现实—认知—语言这一进程,即现实作用于认知,认知影响语言。^[1]也就是说,语法构造是基于身体经验通过认知加工形成的,从语义或概念结构到表层结构的投射来看,汉语句法参照概念领域的原则,多于参照句法和形态范畴上起作用的原则,是一种注重意合的语言,造句要求意念连贯,不求结构完整;英语的词序却受

抽象的句法规则的支配,是一种注重形合的语言,造句注意形式接应,要求结构完整。因此在很多情况下,汉语可以隐含主语和一些虚词,但英语却不能。这说明了汉语这种语言具有隐含特征,而英语这种语言具有显化的特征。认知语言学家们认为人们的思维、心智、概念都是直接基于现实世界、感知体验及身体运动的,客观世界中的范畴、特征、关系对它们的形成有基础性的始源影响,王寅将“现

收稿日期: 2013-05-09

作者简介: 康灿辉(1974-),女,湖南株洲县人,湖南工业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语言学及英语教学、语言与文化对比。

实—认知—语言”这一过程细化为“现实—体验—意象图式(image schema)—认知模型/理想化认知模型(cognitive model/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CM/ICM—范畴——概念——意义——语言。”^[2]我们认为思维模式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背景对意象图式的建构有着很大的影响,在对现实进行体验的基础上,经过思维、意象图式、范畴等程序“过滤”之后,语言的词汇、结构受到很大的影响,致使语言产生了差异。现实差异越大,人在认知基础上引起思维、范畴、概念的差异也就越大。

汉语隐含和英语显化这一差异正是这种互动的结果,而这一差异在主语和虚词方面表现最明显。我们试图运用体验认知观从这两方面对汉语的隐含和英语的显化进行阐释,认为这一差异是一个不太相同的客观现实——不同体验——不同思维——不同意象图式——不同范畴、概念、意义——不同语言结构的过程,是主体的认知与客观现实包括社会文化背景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 汉语主语的隐含与英语主语的显化

汉语句子中的主语在很多情况下都可以隐含。如(1)“小王回家了,下周三才来。”(2)“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3)“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些在汉语中都是再正常不过的表达,而在英语句子中,主语的权威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可动摇(只有在祈使句、人物对话或个人简历中有时可省略)。如(4)“Come in, please.”。所以在英译时,我们得把上述句子的主语译出来:(1)“Xiaowang went back, and he will come next Wednesday.”(2)“He who makes no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has no right to speak.”(3)“Walls have ears.”

汉语和英语句法中为何会存在此差异呢?认知语言学家认为客观世界是人们体验和认知的基础,人类语言的句法结构是基于现实基础上体验和认知的结果。语言与人类其它方面的认知能力是不可分离的,它具有有机体性,是来自各种内在因素和经验因素(身体,生物,行为,心理,社会,文化和交际等)的互动。^[3]语法的形成和运用与人们对外界的经验和感知密切相关,对其描写必须参照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体验过程以及基于其上形成的认知策略和规律。ICM(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的产

生以人的身体经验为基础,是当代体验哲学(Experientialism)的主要内容,而体验主义哲学认为人对世界的概念化带有生物、文化等人的相对因素,对世界的感知是一种能动过程。人对世界的概念化,概念化导致的范畴化、图式化和语法化,取的是“现实世界→概念化→范畴化/图式化→语言形状”的历时语言学思辩模式。由于其中关键部分概念化的结局是ICM,语言形式也带有ICM的踪影,因此在分析或研究带有这种踪影的语言时,就必须启动相应的ICM方式。熊学亮认为汉语句子主语是[名词←零主语]形式,可以分为三类:A[名词←Oa]如例(1)、B[Oe←Oa]如例(2)和C[Oe]如例(3),这里Oe和Oa分别表示句外指零主语和句内指零主语两种概念。而英语多半呈A[名词←代词]或B[名词],很少出现C[Oe]如例(4)现象。^[4]我们可以分别用图1、图2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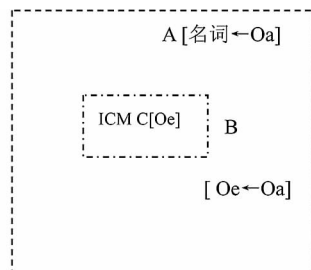


图1 汉语主语的 ICM 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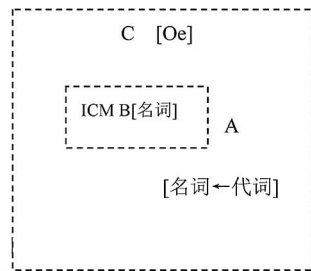


图2 英语主语的 ICM 模式

如图1、2所示,汉语中Oe式的C型比A、B型都典型,其中B型又比A型典型;而英语中B型比A、C型典型,A型又比C型典型。我们在前面提到语言的产生是一个“现实—认知—语言”的过程,我们分别用L1代表汉语,L2代表英语,如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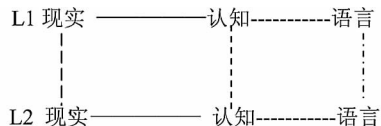


图3 英汉语言产生过程图示

王寅认为,从现实—认知—语言是呈横向递减的趋势,这是因为人的认知虽然不断发展,但相对无限的现实世界总是有限的;而语言相对于人的认知经验来说,也不总能言尽其意,因此它们之间用越来越虚的连线。^[5]纵向来看,L1(汉语)所处的中国现实与L2(英语)所处的西方国家有所差别:中国面临的是半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长期的闭关锁国的客观现实,而西方大多数国家处于开放的海洋性地理环境,工商业,航海业发达,但两者之间存在一些共性,因此在两个“现实”之间,基本是直虚线相连。不过,在两个“认知”之间的对应关系就有所减弱,操不同语言的两个客观世界,由于各自对现实的体验不同,民族之间的思维方式会有差异:中国人形成了以儒家、道家和佛教为哲学基础的认知思维方式,这种认知思维方式重“领悟”,重“言外之意”乃至重“含蓄”,追求“韵致”,重视模糊性。当这种内敛与模

糊的认知思维影射入人们的头脑后就形成了图1中的意象图式,从而形成模糊范畴和概念结构。而弥漫于欧洲的是以理性主义为哲学背景的认知思维模式,它强调科学实践,注重形式论证;寻求外部世界对人最有价值的东西,整个思维是开放型的;而且西方人自古以来就重视数学和逻辑,因而精确性是其思维方式的一大特征。因此这种重形式,强调精确的认知思维形成了图2的意象图式,相对地形成了形式化和精确的范畴和概念结构。再延伸至两个“语言”之间的对应关系时,因为有了现实对认知的决定作用,它们的差异会更大,我们用更虚的线表示。中国人习惯于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当这种内敛模糊的概念结构映射到句法结构中,就形成了主语隐含句。西方直接和精确、清晰的概念与范畴结构,表现在语言上即强调形态的外露及形式上的完整,表现在句法上就是主语的显化与明晰。我们用图4描述整个认知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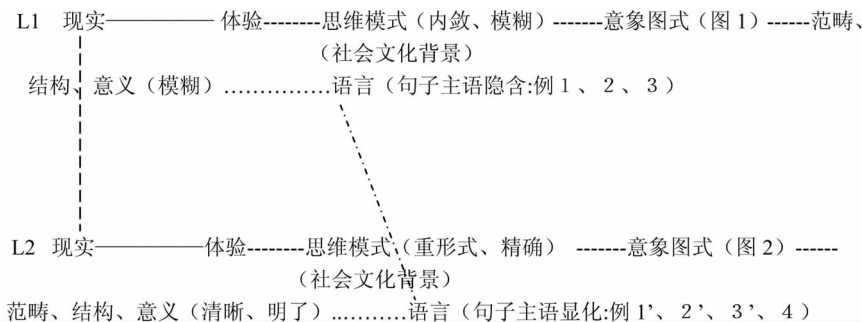


图4 英语句子主语隐含和汉语句子显化过程图示

二 汉语虚词的隐含和英语虚词的显化

汉语句要求达意,直接反映思想,英语句注重形式联系、逻辑的合理性。因此,汉语中少用或不用连词、关系词和介词等,而英语中却常用和多用。汉语属于意合性语言,它没有词形变化,没有非谓语句、定语从句、独立主格和冠词,特别是在许多情况下省略虚词(尤其是连接词),注重以神摄形。正如刘宓庆所说:“汉语在表达思想时采用的是思维直接向语言外化的方式,而不是像屈折语那样,采取间接的方式。后者中间必须有一个形式/形态程序装置,接受思维的投射,才能转化为语言的表层结构。”^[6]因汉语是以某种直接反映思想的方式,所以汉语句子有时成浓缩状况,用词特别节省洗练。例如(5)“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成为惯常说

法,而不说成“若知彼又知己,则百战不殆”。再如(6)“不知苦中苦,哪知甜中甜”可解释为“(如果你)不知苦中苦,(怎么又)会知道甜中甜呢?”可译为(6)‘If you have never tasted the bitterness of gall, how can you know the sweetness of honey?’

与汉语不同的是,英语是一种形合语言,其词语、短语和分句连接成句,均离不开连词(如 and, but, or, so, because, however, either...or, therefore, if, as, since, unless, while, etc.)、关系词(如 that, which, who, what, how, etc.)、介词(如 on, in, of, to, with, about, along with, etc.)等。比如:

(7)“He looked for the girl whose heart he knew, but whose face he didn’t, the girl with the rose.”

(8)“Taking a book off the shelf he soon found himself absorbed, not by the words of the book, but

by the notes penciled in the margin. ”

显然,例(7)中如果没有 whose, but, with 这些关系词、连词和介词,例(8)中如果没有 by, in, but 这些介词和连词就不可能把词语、分句连接起来,也就不可能表达意思。又如下列一组表示同义对译的英、汉语句子:

(9) “It was what sentimentalists, who deal in very big words, call a yearning after the ideal, and simply means that women are not satisfied until they have husbands and children on whom they may center affections, which are spent elsewhere, as it were, in small change. ”

(9)’ “一般情感主义者喜欢用大字眼,称之为对理想爱情的渴望。换言之,他们认为女人的情感平时只能零星发泄,必须有了丈夫和孩子,情感收聚起来有了归宿,自己才能得到满足”。

与英译汉完全不同,汉语中隐含的各种逻辑关系因没用连接词而趋于模糊,英译时就应该变隐含为明示,理清其逻辑关系,并用适当的连接词构成形合句。

汉英中这种结构上的差异来源于不同客观现实的体验,从而形成不同的思维模式:小农经济使中国的先民们意识到丰收离不开风调雨顺,生存离不开自然的恩赐,因此强调“万物一体”、“天人合一”;主张以无知无欲无思之心去直觉体悟宇宙本体,强调“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提倡“心净自悟,顿悟成佛”,极力消除语言文字对思维的束缚,在超时空、非逻辑的意识下实现绝对超越,进入佛性本体境界。强调事物的整体性成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一大特征。这种思维重直觉而轻论证,缺乏结构严谨、条理分明的实证分析。而在西方,由于思维讲求理性与科学,重视分析和实证,故必然借助逻辑分析,在论证、推演中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这种逻辑思维偏重从事物的本质来把握表象,这是思维对事物整体加以分析的结果。^[7]分析性思维有两个不同层次,其中之一是把整体分解成部分,将其割裂开来、抽取出来、孤立起来,将复杂的事物分解成具体的细节或简单的要素,然后再深入考察各部分、各细节、各要素在整体中的性质、地位、作用和联系,从而了解其本质,并弄清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思维的差异必然影响意象图式的建

构,我们分别用图5和图6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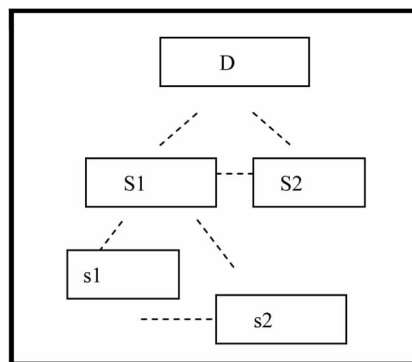


图5 汉语的意象图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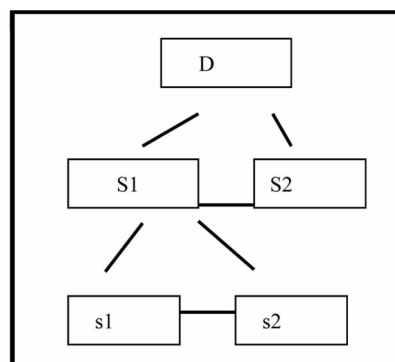


图6 英语的意象图示

我们用 s1、s2 表示子句, S1、S2 表示大句, D 表话语、篇章, 大框表示整个话语或篇章, 小句组合成大句, 大句组合成话语、篇章。中国人思维强调整体性, 轻逻辑, 因此各个子句之间没有紧密的联系性, 只重整个句子或篇章结构(我们用虚线表示各子句之间的关系, 用黑线突显整个篇章); 而西方人重分析、逻辑推理, 因此他们即强调各句间的联系性(我们用粗黑线表示), 同时也强调整体性。在对现实体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思维模式受社会背景文化的影响构造出不同的意象图式, 当中国人的意象图式形成了重整体, 轻逻辑、实证的概念范畴, 从而使汉语句子重意合, 重辩证思维, 即不凭借严谨的形式来作分析, 而是根据主观直觉从逻辑及上下文“悟”出关系来。句中各意群、成分内在关系的联结与呼应, 只要可以“意会”的, 很多的联系词都可以不出现。如例(5)、(6)(9)’中, “若……则”“如果不……怎么又”等词都可省略, 因此, 汉语句子显得简约而又模糊, 句法功能呈隐性。对比之下, 西方人擅长形式逻辑, 习惯严密的逻辑推理, 在语言上表现为重形合, 讲形式, 求结构上的严谨, 较多

运用关系代词或关系副词等,其表现形式严格地受逻辑形式支配,概念所指界定分明。例(6)'、(7)、(8)、(9)借用了“if...; for, whose, but; what,

who, that... ”等连词而使得句子组织严密,层次井然,因此英语句法功能多属外显性。我们用图7表示这一认知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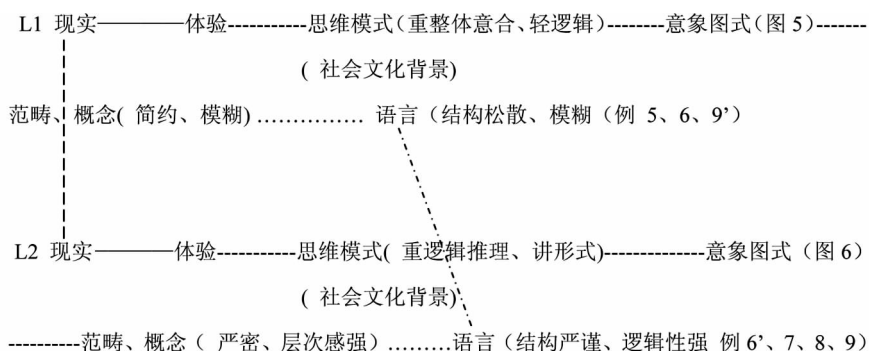


图7 英汉思维模式和认知过程图示

人以自身的感觉器官直接感知客观世界,在与客观世界的互动中获得经验,这一过程乃是将客观世界范畴化、概念化的过程。语言作为人们认知世界的经验结构和表征形式,映照了这一过程,从而使语言活动与认知现象处于一种完全的相互印证的状态。语言在运载概念的同时,存在着个性的问题,即各民族所特有的认知思维方式。由于各自体验的客观现实有所不同,中西认知思维方式就有差异:中国人更长于总体把握,把宇宙看作是一个整体,充塞其中的是“道”或“气”,而西方人更长于条分缕析,把宇宙看作是一个原子,各自独立又彼此联系;中国人重悟性,西方人重理性;中国人重模糊性,西方人重准确性,在这样不同的认知思维定势的影响下,势必会影响意象图式的建构,概念范畴的界定。当中国人的模糊观、重悟性与西方人的准确、重理性分析的概念范畴反映到语言上便会产生:汉语倾向于意合,语言形式零散,句法结构呈隐性;英语则倾向于形合,语言形式聚合,句法结构呈显性。因此,汉语与英语表现出的这一差异是主体

与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

参考文献:

- [1] 王寅. 语言的体验性——从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看语言体验观[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5(1): 37-44.
- [2] 王寅. “现实—认知—语言”三因素间的反映与对应滤减现象[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1998(3): 70-76.
- [3] 周国辉, 张彩霞. 汉语主语的隐含与英语主语的显化[J]. 外语教学, 2003(5): 35-38.
- [4] 熊学亮. 语言的 ICM 和语言研究的 ICM[J]. 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3(2): 134-141.
- [5] 王寅. “现实—认知—语言”三因素间的反映与对应滤减现象[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1998(3): 70-76.
- [6] 刘宓庆. 思维方式、表现法和翻译问题[J]. 现代外语, 1993(1): 12-15.
- [7] 连淑能. 论中西思维方式[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2(2): 40-48.

责任编辑: 李珂